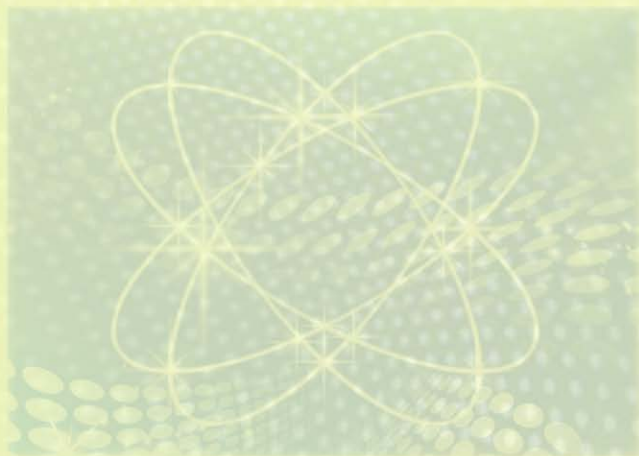


新闻学论集(第23辑)

郑保卫 主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闻学论集 . 23 / 郑保卫主编 . — 北京 : 经济日报出版社 , 2009. 12

ISBN 978 - 7 - 80257 - 133 - 4

I. ①新… II. ①郑… III. ①新闻学—文集 IV. ①G21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0846 号

新闻学论集 23

主 编	郑保卫
责任编辑	汤雪梅
责任校对	徐建华 刘 涛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邮编: 100054)
电 话	010 - 63567690 63567691 (编辑部) 63567683 (发行部)
网 址	www. edpbook. com. cn
E - mail	jjrb58@ sina. 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山润国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mm 1 / 16
印 张	19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57 - 133 - 4
定 价	48. 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新闻学论集》编委会顾问

甘惜分 蓝鸿文 罗 列 何梓华 秦 珪 郑兴东 成 美

《新闻学论集》编委会成员

主 任：方汉奇 赵启正

副主任：郑保卫 倪 宁 高 钢

委 员：喻国明 陈力丹 蔡 雯 涂光晋 杨保军 彭 兰

《新闻学论集》编辑部成员

主 编：郑保卫

副主编：喻国明 蔡 雯

编 辑：郭 平 李玉洁

致读者

2009年，我们是在举国上下亿万民众喜迎与欢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时光里度过的，也是在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共同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挑战中度过的。回顾过去的一年，那许许多多令人难忘的日子依然历历在目，特别是新中国成立60年大庆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的盛大场景，更是令人永远难以忘怀！

在过去的一年中，紧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我国新闻工作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广大新闻工作者以改革与创新的出色行动向祖国母亲献上了一份厚礼。

总结2009年新闻工作的成绩和经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是新中国60年大庆报道的成功，显示出我国重大主题报道积累了更加丰富的经验，在体现全方位、多样化和高水平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做出了更大的成绩；

二是新闻媒体关于应对金融危机的深入报道，反映出我国新闻工作者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深刻理解，和对引领我国企业与民众应对危机的高度责任，说明面对危机，新闻媒体应当担当起帮助民众树立信心、交流经验、明确方向和途径的庄严使命；

三是新闻媒体关于“7·5”乌鲁木齐暴力事件等突发事件的报道，表现出我国政府在处理突发事件中的自信与开放，也体现了我国突发事件报道已进入一种常态化的专业轨道；

四是世界媒体峰会在中国召开，表现出我国政府对待境外媒体更加主动、从容和开放，同时也表达了我国新闻传播进一步扩大开放，并尽可能实现与国际接轨的愿望；

五是近年来网络舆论传播的实践说明，网络舆论传播已经成为民意表达

和社会监督的一支重要力量，须善于用其功，扬其利，弃其弊，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消除其消极影响；

六是对淫秽色情网站及各种低俗之风的整治，今年再出重拳，取得了一定成效，也得到了社会与公众的好评，这说明整治打击色情网站和低俗之风，须常抓不懈，注重效果；

七是根据形势发展和新闻工作的实际需要，《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进行了第三次修订，其顺利践行，须靠新闻界的高度重视和严格遵行，以使其真正发挥作用；

八是当前我国报刊的转企改制已是大势所趋，需要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以顺应报刊市场需求，遵循文化产业发展规律，使转企改制工作能够深入进行，真正取得好效果。

总结 2009 年新闻工作存在的问题，同样会给我们以启示：

一是虚假报道、“有偿新闻”、不良广告、低俗之风“四大公害”已为祸多年，迄今依然猖獗，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要实现彻底整治，还须抓根本，断根源，求实效；

二是近年来侵害记者的现象屡屡发生，且不断变换手法，情节也越来越严重，记者的维权之路愈加艰难，因此，须加大对记者的保护力度，要尽可能凭借法律的力量为记者提供护身之盾；

三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当前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要谋求持续发展，须更加重视受众和市场的力量，进一步提升市场化水平，增强其适应市场变化和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

四是分析新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其中许多都与新闻法制密切相关，因此，进一步推进新闻法制建设，营造良好的新闻法制环境，是新闻界根治弊端，实现新闻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路径。

在总结 2009 年我国新闻事业发展和新闻工作成绩的时候，我们发现，随着信息化时代和媒介化社会的到来，以及传媒业自身的快速发展，新闻传播在当前社会中对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今年以来，从应对突发事件到摆脱金融危机，从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从维护国家形象到提升国家软实力，我国新闻媒体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例如7月间发生的乌鲁木齐暴力事件，正是靠着新闻媒介的及时报道和有效引导，才使人们认清了少数分裂主义者制造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的真实面目，旗帜鲜明地维护了正义，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尊严，从而赢得了国内广大群众以及世界友人的理解和支持。

而在波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机面前，我国企业和民众之所以能够保持信心，知难而进，从容应对，新闻传播的作用不容忽视。正是由于新闻媒介及时地对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背景、表现的形式、产生的影响、造成的危害，以及应对的方法做了较为充分的报道，才使我国企业和民众及时认识到了这场危机对我国经济和社会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了解到了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和方法，从而统一了认识，树立了信心，明确了任务，因此，才在应对和摆脱危机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较好地解决了危机所带来的诸多经济与社会问题。

新闻传播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使得社会与民众对新闻媒体和新闻传播增强了信任度与亲近感。这种社会认可度的提高，有助于人们对新闻工作和新闻学科的正确认识与积极评价，也有助于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科的健康发展。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国的新闻学学科建设也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新闻学科的学术地位有所提升，其影响力也在扩大。在年初教育部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人才培养与学术繁荣工作座谈会”上，陈希副部长在讲话中就把新闻学与法学和社会学一起，作为当前我国文科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三个重要学科之一。而年底在广州召开的，由全国新闻学研究会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承办的2009年中国新闻学学术年会上，学者们对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新闻学学术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总结，更使人们感受到了新闻学创新与发展的潜质和能力。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长期以来，制约和影响新闻学科发展的“新闻无学论”依然存在，有时还会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来。例如，前段时间就有人

以“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①为题，来概括中国新闻学科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状况。按照这一结论，我国新闻学经过30年的改革与创新，非但没有什么发展和进步，反而是在走向没落和衰败，犹如夕阳西下，“走入黄昏”。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此类观点的出现，不能不引起我们对新闻学学科发展问题的警醒！

因此，进一步加强新闻学学术研究，提升新闻学学术研究的质量和水平，促进新闻学学科的繁荣和发展，维护新闻学学科的声誉和地位，依然是我们今后的不懈追求和重要任务。对此，我们应当有明确的意识和坚定的信心。

正如笔者在与上述一文的作者商榷的文章中所写的：“纵使今后发展的道路上还会有荆棘，有坎坷，有困难，有曲折，但我相信，有国家的支持、人民的信赖、学界的努力和业界的配合，中国新闻学就绝不会是‘走入黄昏’的‘夕阳’，而是会像穿越朝霞喷薄而出的旭日一样，充满活力，光芒四射，就一定会挣脱各种非学术因素的羁绊、束缚和干扰，祛除自身的弱点、缺点和不足，永远向着光明前进，朝着辉煌迈进。”^②

当21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第二个十年就要到来的时候，抚今追昔，我们满怀自豪与喜悦，同时也充满期待与信心。今后我国新闻事业与新闻学科的改革和发展之路依然漫长而艰巨，需要我们继续在前进的路上永不止步，奋力前行！

《新闻学论集》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

郑保卫

2009年12月26日

① 郜书锠 《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现代传播》，2009年第3期。

② 郑保卫 《迈向辉煌的中国新闻学——与郜书锠同志商榷》，《现代传播》2009年第6期。

目 录

致读者	郑保卫 1
-----------	-------

[史海钩沉]

邵飘萍职业认同探析	樊亚平 1
-----------------	-------

“昙花一现”亦风流：厦门大学早期新闻教育活动考评

.....	黄 伟 毛章清 17
-------	------------

[理论前沿]

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现实意义与实践价值	郑保卫 32
---------------------------	--------

从“驯服工具”到“以人为本”

——认知新闻事业人民属性的六十年历程	童 兵 49
--------------------------	--------

自由与秩序的平衡：我国新闻阅评工作的法理基础	赵中颖 洪海林 64
------------------------------	------------

传媒保障公民权利“入宪”探析	虞继光 76
----------------------	--------

媒体关系的概念辨析及其学科范畴	赵振祥 87
-----------------------	--------

大众传播时代的青少年亚文化	蔡 骐 102
---------------------	---------

西方新闻理论的传入与反思	刘行芳 115
--------------------	---------

中国新闻理论体系的本土化建构	刘自雄 132
----------------------	---------

论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新闻学研究	李玉洁 141
----------------------	---------

[实践探索]

财经记者要有公众意识和责任感

——兼评 2009 年重大财经新闻事件与报道 苏培科 155

[新闻教育]

对新闻理论教学中若干关系的探索思考 丁柏铨 167

在网络时代重思新闻教育 胡 泳 176

论我国内地新闻理论教师应有的教学姿态 赵星耀 189

对新闻理论案例教学中教师角色丛嬗变的思考 徐文策 197

从传媒腐败透视新闻伦理教育的误区与走向 路 鹄 208

[特别策划：传媒六十年]

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报业改革发展的基本历程 祁 涛 孙 菲 218

中国电视 50 年的发展历程 欧阳宏生 李 镭 237

从“探索调整”到“改革创新”

——新中国广播 60 年发展历程与未来趋势 许 海 248

新中国成立 60 年新闻事业变革发展大事记

(1949 年 - 1977 年)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264

《新闻学论集》征稿启事 313

[史海钩沉]

邵飘萍职业认同探析^①

樊亚平

邵飘萍是我国新闻史上叱咤风云的报界巨子。近30年来对他的研究与其他新闻史人物相较可谓成果丰硕,评传和其他著作六七部,各类论文或文章七八十篇,选集或文集数套,更不要说各通史和名记者研究专著中都会有关于他的专章或专节内容了。然而,综观这些研究,可以发现,与整个新闻史人物研究的普遍取向一样,这些成果大多着力于对邵飘萍新闻经历、新闻思想的介绍、概括和新闻作品、历史贡献的分析、评价等;从这些成果中,难以把握邵飘萍从事新闻职业的内在心路,难以充分感受到邵飘萍对其新闻职业的认同状况。

针对新闻史人物研究中存在的重新闻思想、历史贡献而轻从业心史、职业心灵等问题与现状,笔者曾在《从历史贡献研究到职业认同研究——新闻史人物研究的一种新视角》一文中提出引入“职业认同”视角研究新闻史人物职业意识与心灵,以还原历史情景,展示历史研究的丰富性之主张^②。本文即打算运用该文提出的设想与思路,对邵飘萍从事新闻职业的内在心路和他对新闻职业的认同状况进行研究,以呈现邵飘萍新闻从业行为背后的心灵世界,也借此对现有新闻史人物研究提供更具体的启示。

本文试图围绕的核心问题是: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著名的记者,邵飘萍对其新闻职业是否具备发自内心的真正认同?这种认同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和层面?在职业认同方面,邵飘萍与其之前的新闻从业者相比获得了什么样的进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进步?

①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我国近代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研究(1815-1927)》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09XJC860001。

② 樊亚平:《从历史贡献研究到职业认同研究——新闻史人物研究的一种新视角》,《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8期。

从业缘起与动机是把握一个人职业认同的基础。邵飘萍缘何而投身新闻业呢？与民国之前多数新闻从业者涉足新闻业首先是因为某种急迫的现实政治目标与政治理想不同，邵飘萍涉足新闻业，首先是因为其自少年时代便逐渐培育和熏陶出来的对报刊与新闻的志趣和理想。邵飘萍 1886 年生于浙江东阳，5 岁开始在父亲的私塾读书，1899 年考取秀才，1903 年入位于金华的省立第七中学上学，1906 年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读书。邵飘萍的新闻志趣和理想就是在“浙高”读书时确立的^①。

当时，正值甲午战争引发的民族危机与随之而来的亟求“救亡”的改革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活动交替进行之时。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对时代脉搏与主题的感应最为迅速。这种对时代脉搏与主潮的感应，加上浙江士子精神传统中素有的感时伤国的危机意识、关切社会问题的经世意识和讲求气节与精神的道德主义倾向，以及“浙高”素来崇尚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孳孳为学，互以敦品励行相勉”^②之学风，为邵飘萍发蒙和立志从事新闻事业提供了思想和精神资源。

这样的思想和精神资源，再加上进入“浙高”后较为便利的报刊接触机会和参与新闻工作的良好环境，很快便催生了邵飘萍对新闻职业的最初志向与兴趣。由于“浙高”是当时浙江最好的学校，以培养国家振兴之才为目的，故对学生读报非常鼓励。学校规定，每晚及“休沐之日”不定功课，学生应利用此时间自行浏览经史古文和中外各种报纸。为方便学生读报，学校还专门辟有“书报阅览室”，每晚 8 点后对学生开放。这种读报环境与氛围，对邵飘萍认识报纸、立志献身新闻事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启蒙作用。

“浙高”时期的邵飘萍不仅沉迷于阅报，而且与同学集资订购《杭州白话报》，分送给学校周围的茶馆、酒楼供市民阅读。为了让更多民众了解报纸内容，邵飘萍与其同学还定期在百姓经常聚拢的地方轮流讲解《杭州白话报》

① 郭汾阳 《铁肩辣手——邵飘萍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1 页。

② 散木 《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 年，第 86 页。

的内容。曾是“浙高”学生和教师的钱家治曾回忆说“凡同学于每星期日有被抽签举任讲解者，均须前往，不得辞谢。”^①这种公开的讲报活动对邵飘萍和其同学理解报刊及其功能，进而产生投身新闻业的志趣，更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浙高”时期对邵飘萍确立新闻志向具有更直接作用的是，邵飘萍“和他的一些同学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从事新闻的经验了。”^②在“浙高”读书期间，邵飘萍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到上海的《申报》撰写杭州和浙江地方通信——他后来毕业回到金华任教时，仍继续为《申报》撰写通讯，并被聘为特约通讯员。另外，在“浙高”时，邵飘萍还曾有过办《一日报》的经历和体验。虽然这张报只是邵飘萍和他的同学为配合1908年浙江省运动会而办的临时小报，但这次经历无疑是邵飘萍正式投身新闻业前的“试水”，对育化其新闻志趣显然具有诱发作用。

另外，梁启超对“浙高”时期的邵飘萍发蒙新闻理想影响也非常大。梁启超此时虽在海外，但“浙高”学子对其可谓情有独钟^③。梁启超富有激情和“带电”的报刊文字和其对报刊功能与地位的赞美对正在发蒙新闻志向的邵飘萍来说，影响无疑非常巨大。不仅梁启超对报刊功能与地位的赞美很可能最终促发了邵飘萍投身新闻业的志向，梁启超的“舆论界骄子”的地位和大名也很可能激发了邵飘萍对舆论界的更加强烈的向往。

由于上述多方面因素的合力作用，使“浙高”时期的邵飘萍即已产生了对新闻事业的兴趣和投身新闻事业的志向。而正是由于这种志向与兴趣的召唤，最终使他走上了记者生涯。邵飘萍就曾明确表述过自己对新闻职业的兴趣与志向，他说“余百凡不介意，不求爵禄，不事产业，所萦于心怀者，厥惟新闻事业”^④；又曾说：余“百无一嗜，唯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⑤。

① 《求是书院之创设与其学风及学生生活情形》，《浙江大学简史》第一、二卷，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62页。

② 郭汾阳《铁肩辣手——邵飘萍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页。

③ 史寿白《求是书院掌故》，《浙江大学简史》第一、二卷，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64页。

④ 汤修慧《先夫子言行记略》，来源自肖东发、邓绍根编《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1页。

⑤ 潘劭昂《我负飘萍先生》，《邵飘萍先生被难纪念特刊》（京报），1929年4月24日，来源自邵飘萍著，肖东发、邓绍根编《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9页。

这种因新闻志趣而投身新闻业的情况，使邵飘萍的职业认同从一开始就显现出与前代新闻从业者的明显不同。前代新闻从业者如改良派报人或革命派报人大都是先产生急迫而具体的维新或革命目标与方案，为实现其维新或革命目标才选择投身新闻业的。为实现新闻业之外的目标而选择新闻业，必然出现“身在曹营心在汉”之情况，从而影响从业者对其职业的内心认同。相反，因新闻志趣而投身新闻业，其对新闻职业的认同感必然较易获得。由此来看，即使不考虑职业认同的其他考量指标，单就从业缘起与动机来看，也已经可以说邵飘萍的职业认同相较于前代报人已有很大进步了。

当然，仅从年轻时代孕育出的新闻志趣来把握邵飘萍从事新闻职业的动机，未免失之肤浅。如果说邵飘萍最初投身新闻业确是基于“浙高”时期熏染出的新闻志趣的话，在其投身新闻领域后，之所以能一直保有持续不竭的新闻志趣与职业激情，则主要是由于在其新闻志趣背后有近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精神作为支撑，并为之持续驱动。这种知识分子精神与邵飘萍的新闻志趣相结合，形成了为后世学者津津乐道的“新闻救国”理想。换句话说，知识分子精神与“新闻救国”理想，是邵飘萍投身新闻业后能够使自己的职业生涯逐步走向巅峰的动力之源和精神之本。

“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① 这些文化人最突出的精神特质是独立性、批判性，推崇自由、民主、公正、理性和公共关怀，以“社会的良心”自任。邵飘萍无疑正是这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精神的新闻从业者。这种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精神与邵飘萍从浙江士子传统中承传而来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和“不应沾之于贪权功利为满足”等价值关怀相结合，形成了邵飘萍对作为现代自由民主之产物与表征和作为独立批评与监督之公器的新闻业的持续不断的兴趣与追求。

这种基于知识分子精神而产生的对新闻业的持续志趣与追求，与混乱、动荡、黑暗的中国前途命运结合起来，进而催生了其以新闻“救国”的理想。虽然“新闻救国”是后世研究者通过对邵飘萍新闻生涯的动机探究与分析而

^①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页。

获得的一种认识，邵飘萍本人并未用“新闻救国”一词表述过其从事新闻业之动机，但从其曾经说过的与记者“天职”或报纸功能相关的许多话和其涉足新闻业后始终站在自由、民主、爱国、进步之立场，对所处时代的各种政治、社会问题或进行无情鞭挞或尽力引导维持等职业努力中，无不感受到其试图借“新闻”挽回国家劫运，促使国家走上文明、民主之路的“救国”诉求与动机。

需要指出的是，邵飘萍从业动机中的“救国”取向与他之前的报人为扶危救国而涉足报刊领域虽有一定相似之处，但更多表现出不同。前代“报人”办报主要是为其扶危救国诉求下的政治目标服务，报刊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工具，政治为体，报刊为用。而在邵飘萍的“新闻救国”中，“新闻”和“救国”合二为一，无所谓体，也无所谓用；而且，“救国”在邵飘萍的职业语境中，并不对应着某种明确的政治目标或方案，而是一种与自由、民主、理性、进步等相关的现代价值体系。

尤为重要的是，在邵飘萍看来，“新闻”是一种有独立自存价值的职业存在，“新闻”自亦有道，故其“救国”效用的发挥只能通过“新闻”特有的方式来实现。换句话说，邵飘萍是将“救国”之目标和诉求“化”进了“新闻”本身的价值系统中，而不是将“新闻”完全“化”入了“救国”目标。由此看来，邵飘萍的从业动机中虽然与前代“报人”一样蕴含着“救国”诉求，但这种“救国”显然不太像前代“报人”的救国之志那样牵制和消解其对新闻职业的价值认同。

二

职业情感、忠诚度是考察职业认同的核心指标。怀抱新闻兴趣、志向和“新闻救国”理想投身新闻领域的邵飘萍，对自己所选择的新闻职业的情感与忠诚度究竟如何呢？

邵飘萍对新闻职业的情感、忠诚度首先可以从其“生平未曾改业，可谓以新闻记者终其身”^①得以看出。邵飘萍从1911年12月以主笔《汉民日报》

^① 散木 《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第43页。

为标志开始其新闻生涯以来,直到最终“以身殉报”,再也未曾离开过新闻职业岗位,也没有表露出放弃新闻职业的任何迹象和念头。若拿邵飘萍对新闻职业的这种执著和“从一而终”与前代报人的“身在曹营心在汉”相比,明显可以看出邵飘萍对新闻职业的深厚情感和相当高的忠诚度。职业情感与忠诚度如此,对其职业是否具备认同也就是不言自明的了。

邵飘萍对新闻职业的情感、忠诚度也可以从其对记者职业的地位、辛劳、艰险等有着深入了解,却能满怀热情地投入记者职业,并矢志不变、敬业奉献、尽职尽责中得以看出。

无论从邵飘萍投入记者职业之前还是从事记者职业过程中的情况均可以明显看出,他对当时在中国从事新闻职业所存在的危险、当时记者社会地位之低下及从事记者职业的辛劳等是非常清楚的。在从事新闻职业前,通过张恭及《翠新报》他就已知道了“办报之艰险”^①。从事记者职业后,对这种艰险的了解就更直接、更深刻了。这一点从《汉民日报》时期他“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逮捕三次,下狱九阅月”^②之遭遇和此间他曾说的“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斫也”^③之语即可推知。以后他更曾明确说过,在中国从事新闻记者职业“尤有不安全之恐慌”^④。

清楚记者职业之艰险的同时,邵飘萍对记者职业的辛劳也深有了解。在《新闻学总论》中,邵飘萍曾说,新闻记者从事的是“精神劳动与肉体劳动”之双重劳动,这种劳动“日夜不休”;同时说“新闻记者之业务,每与普通卫生之原则背驰。其最无法避免者:(一)睡眠时间比常人少,(二)饮食无适宜之量与时,(三)脑筋之终日不得休息,(四)晨夕奔驰,不能为适当之休息与运动。”^⑤1925年,在《京张三日旅行记》中他又说“新闻记者之生

① 旭文《邵飘萍传略》中谈到年轻的邵飘萍与当时创办有《翠新报》的反清知名人士张恭的交往时说“年轻的邵飘萍到底是否参与过报事(指《翠新报》),现今尚无从考证。但飘萍从《翠新报》获得报业的最初印象,并知道张恭办报之艰险则是无疑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2页。)

② 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余白》,来自邵飘萍著,肖东发、邓绍根编《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4页。

③ 邵飘萍《唤醒虞签事(二)》,汉民日报,1912年5月10日,来自方汉奇主编《邵飘萍选集》(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91页。

④ 邵飘萍著,肖东发、邓绍根编《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9页。

⑤ 邵飘萍著,肖东发、邓绍根编《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3、115页。

活，不眠不休之生活也。”^①

明知记者职业充满风险，缺乏足够的社会尊重，且十分辛劳，却选择了这个职业，这说明，邵飘萍投身新闻职业决非仅凭一时热情或对新闻职业的皮毛了解而产生的行为，而是一种建立在对新闻职业的各方面利害关系的明确认识之上的理性选择。明知新闻职业的各方面利害尤其是不利方面却依然选择新闻职业，由此也可以推知其对新闻职业的情感与忠诚度，进而也可推知其对新闻职业的认同度。

基于明确认识而理性选择新闻业后，邵飘萍的实际工作状态如何呢？他对自己选择的新闻职业是否全身心投入并体现出足够的热情、激情和敬业程度呢？

邵飘萍是以《汉民日报》为起点正式开始新闻生涯的。关于《汉民日报》时期邵飘萍的新闻工作状态和对新闻职业的身心投入程度，从他办《汉民日报》之同时继续担任上海申新两报通讯员和兼任《浙江军政府公报》编辑以及因“办报出色”“被推为省报界公会干事长”等^②即可推想到。讨袁时期，邵飘萍同时“为《申报》、《时事新报》、《时报》执笔”^③，对新闻工作激情更盛，因“正值壮年，写作甚勤，往往一日能撰写数篇时评”^④。担任北京特派记者时期，由于同时创办有新闻编译社，工作更忙、更投入，每天“自朝至午夜，殆无休晷”，“电报日一二千字，通信殆无间日。”^⑤

创办《京报》后，这种敬业之程度有增无减。这一点，从1919年邵飘萍因安福系通缉而逃亡期间仍“手不停挥”地继续撰文即可说明。邵飘萍的另一个妻子祝文秀曾回忆邵飘萍逃亡期间仍不停止工作的情况。邵飘萍受通缉时先逃到了天津，后潜至上海。在天津期间，他虽身处危险之中，却“继续挥笔撰文”；为写文章，他还曾派祝潜回北京取过一些参考用书。逃到上海后，邵飘萍曾生过一场大病，但患病期间，他“仍手不停挥，每天都有大量

① 方汉奇主编《邵飘萍选集》（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558页。

② 散木《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第94页。

③ 邵飘萍著，肖东发、邓绍根编《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4页。

④ 散木《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第117页。

⑤ 潘公弼《纪念飘萍先生》，来源自邵飘萍著，肖东发、邓绍根编《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7页。

信件和文稿交祝付邮。”^① 被通缉又遭大病，却不中断自己的工作，邵飘萍对新闻工作的敬业与投入由此可见一斑。

邵飘萍自己也曾对其新闻工作和职业生涯做过点滴自述。1921年，他在《新年三日旅行琐记》中说“终日奔驰，……每晚平均睡四五小时，此愚多年以来滥竽新闻界中极可怜不相干之生活也。”^② 1924年在《新闻学总论》中他又曾说“十三年以来，……从未有五日以上卧床之病；且所处地位，决不能有三日完全休息，而日夜操作。”^③ 邵飘萍的朋友对其工作态度与投入程度的回忆证明他的上述自述并未虚言。

顾维钧在给邵飘萍的《新闻学总论》所做序中说：飘萍对其新闻职业“其用心也，专其致力也，勤其于人也，坦然而无所隐。”^④ 张季鸾1929年在《追悼飘萍先生》中也说“余交飘萍久，常叹弗如，夫新闻记者之资格，首为忠于职务，此亦余所愿能，而精力与勇气，则不逮远甚。”^⑤ 面对邵飘萍对记者职业的忠诚与投入、精力和勇气，连张季鸾这样的最终鞠躬尽瘁于新闻事业者也自叹弗如，邵飘萍对新闻职业的敬业程度之高，由此可以想见。敬业程度如此之高，认同于新闻职业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邵飘萍对新闻职业的感情、激情、投入度、忠诚度来源于其职业责任心和使命感。正是因为邵飘萍对新闻职业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才使得他在自己的工作中充满热情、激情并全身心投入。说到邵飘萍的职业责任心与使命感，张勋复辟时，他受记者的职业责任心与使命感之驱使而不顾危险“亲赴天津发电”并在流弹横飞中冒死采访的事不能不提。在当时混乱而危险的形势下，为将新闻及时告知国人而“亲赴天津发电”本身就已显示出邵飘萍强烈的职业使命感，在丰台站利用两军交战、火车受困暂停之机，冒死下车搜求交战情况^⑥，则更显示出其职业使命感之强烈。事后他曾回忆说“当

① 方汉奇《发现与探索——记祝文秀和她所提供的有关邵飘萍的一些材料》，《新闻学论集》第七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12月，第6页。

② 邵飘萍《邵飘萍通讯选》，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109页。

③ 邵飘萍，肖东发、邓绍根编《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5页。

④ 邵飘萍，肖东发、邓绍根编《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9页。

⑤ 张季鸾《追悼飘萍先生》，来源自邵飘萍著，肖东发、邓绍根编《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6页。

⑥ 《中央特别通信》，《申报》1917年7月11日，见邵飘萍《邵飘萍通讯选》，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109页。